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多维向度探析^{〔*〕}

庾 荣

(西安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提炼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并提出要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时代,面对坚守文化根脉、坚持“两个结合”,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任务,基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从五个向度,即历史向度、现实向度、价值向度、实践向度、世界向度等探研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相关问题,其在分别彰显中华文明的自信、自强、自若、自觉与自谦的同时,对于深入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根基、发展动力、基本价值遵循、如何繁荣发展,以及以何种姿态融入世界等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特性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5.004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提炼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并提出要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新时代,面对坚守文化根脉、坚持“两个结合”,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任务,基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探研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相关问题,对于深入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根基、发展动力、基本价值遵循、如何繁荣发展,以及以何种姿态融入世界等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历史向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回答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根基问题

无论是作为近6000年人类历史演进中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之一,^{〔2〕}还是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3〕}在许多文明形态或因政治变革、或因社会变迁、或因历史演变而自行消亡、被迫中断的情境下,中华文明可谓独树一帜,不仅是唯一延续至今、从未中断且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而且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既生生不息,又璀璨夺目。究其原因,是源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这种连

作者简介:庾荣,民族学博士,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

〔*〕本文系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研究”(2024HZ0568)的阶段性成果。

续性的特质使中华文明以其独具特色的文明体系既保持了源远流长,又造就了灿烂辉煌。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无论是通过琳琅满目的文物考古查证,还是通过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查阅,都可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貌的目的。一方面,从文物考古查证。至今已开展 20 余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考古中国,实证了中华民族人类史、文化史及文明史的历史悠久与绵长。仅就文化史来说,一万年,华北地区开始了粟和黍的栽培、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有了水稻的种植,于是定居村落出现;距今六千年前后,粟、黍的栽培技术和水稻种植技术已在长江、黄河和西辽河地区广泛传播,继而,在距今五千五百年至五千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相继进入文明阶段;距今四千年前后,夏王朝建立,其后西周逐步实现对王畿之外广大地区的稳固统治;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六国,至此,中华文明开始步入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文明阶段。在漫长的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创生了丰富的中华古文化,如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这些古老且多样的文化形态见证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魅力。另一方面,从历史文献中查阅。有学者指出,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中国史籍是体现中华文明历史连续性最重要的文献证据与历史依据。^[4]通过典籍文献,古代思想智慧跃然呈现: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几经周折,儒家思想在宋朝全面上位,明朝发展至顶峰,清朝被继续推崇。近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历史情境、时代场域紧密结合,相继创生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了今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分析中华文明的发展理路,虽然从古至今,随着历史变迁、社会变革,中华文明的内涵与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其中始终有一些优秀文化被传承并发扬。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十个成语,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5]无论是强调遵循自然规律、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还是主张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求和谐、谋和睦的天下观;无论是倡导培养公权意识,做到“公天下”的社会观,还是提倡保持个人良好品行的道德观,始终是中华民族不同历史时期所推崇、认可的价值理念,所传承、发展的实践品格,并至今仍然发挥积极作用。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延续不断,贯穿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考古证据丰富确凿、文献典籍卷帙浩繁,究其原因,是其蕴涵的“执性”与“恒性”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执”是执着、执拗,“恒”是恒心、恒守。以汉字为例。因为这份执着与恒守,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从古至今,从未中断过的文字形式,从大约距今六千年半坡遗址等处出现的刻画符号,到殷商后期的甲骨文,再到刻在青铜钟鼎和石鼓上的金文;从西周后期的大篆,到秦统一后古朴典雅的小篆及静中有动的秦隶,再到西汉后的章草、今草,至唐代风驰电掣的狂草及其后将隶书、草书相糅合而自成一体的楷书,以及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易识好写的行书,直至今日使用的汉字,几千年来,虽历经种种变化,但无论是在字形,还是读音,抑或意义,都在发展历程中有序且保持相对稳定的演进。再以中国文学形式为例。因为这份执拗与坚持,中国文学形式,从被视为中国古典诗歌两大源头的《诗经》《楚辞》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古老文学体裁的汉赋,从形式多样的唐诗到相对于古体诗为新体诗歌的宋词,从主要包括杂剧和散曲的元曲到呈现中国小说史上繁荣的明清小说,再到近代的现代文,及至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发展的当代文学,虽然风格各异、形式上不断演变,但实质上主要是为了适应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的需要,而逐渐平民化、通俗化。各个阶段既有传承,又各自独立,呈现出一定的承递关系。

缘于这份“执性”与“恒性”,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历史发展中,虽遭受严重磨难而不衰,历经文化之殇而不辍。无论是经历“书之‘五厄’”,明代胡应麟又提出的续“五厄”,还是近代再一次的“五厄”,中华文明没有被时间打断、被岁月吞噬、被风沙掩埋、被西方工业文明摧毁,没有因王朝更迭、时代变迁而衰弱,因文化冲击、外敌入侵而褪色,仍代代相传,这即是中华文明的执着与恒守。从古时的“民

为邦本”到如今的“江山就是人民”,从“天人合一”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协和万邦”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虽然文化在发展中会面临分化与整合的张力问题,但中华文明在不断演进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这即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总有一些信念、一些精神品格是要始终坚守的,这即是中华民族所孕育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些就是中华文明坚毅与执拗的内在动力源泉。这也凸显了中华文明集“执性”与“恒性”于一体的高度自信。源于这份自信,中华文明虽经沧海桑田,却恒久;虽千帆过尽,却仍以历史自觉的衍生形态不断延续。

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历史场域为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土壤和丰富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的持久与不间断源于中华文明的持久与不间断。这种历史记忆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记忆。对中华文明的珍视与坚守、传承与发展即是对这份集体记忆的不断强化。通过集体记忆的强化,中华文明以自信的姿态在赋予自身丰富养分与巨大能量以使其更加丰盈,并持续发展的同时,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深邃的文化内涵。这即回答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根基问题。

二、现实向度:中华文明积极进取的创新性回答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动力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决定了其“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6]这表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是既守正又创新。翻开历史典籍,最早记载“守正”一词的是《史记》,其中说:“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谓之显荣。”^[7]这里的“正”,是大道之意,指代事物本身的内在规定性或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守正,就是坚守正道。之后,“守正”一词也出现在《汉书》《先待御史府君神道碑》^[8]等文物典籍中。虽然后两者中所出现的“守正”一词更多强调的是个人品行方面,但由己推人,及至万物,均是强调恪守正道。这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直秉承的价值理念。如前所述,在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中,始终有一些“不变”的坚守,这即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体现的即是中华文明的“守正”。在守正的同时,中华文明更加注重创新。“创新”一词,最早出自《魏书》,其中说,“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9]这里的“创新”指通过创造性探索、创新性实践获取新知识、新认知。对于“创新”,中国古人多有论述,如在《诗经》^[10]《礼记》^[11]《淮南子》^[12],以及《少年中国说》^[13]中都指出创新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14]正是“创新”,推动了中华文明在思想、制度、技术等方面不断发展进步,并以“四大发明”及在天文、历法、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的杰出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影响巨大。就守正与创新的关系而言,守正是前提、基础,强调的是承继、延续;创新是发展动力,强调的是创造、开新,二者有机统一于对中华文明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繁荣中。守正使中华文明在历史发展中独具中华文化标识,创新使中华文明在不断演进中永葆旺盛生命力。

新时代,面对“两个大局”,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守正”的同时,将创新的特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作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两个结合”论断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既关注结合双方的高度契合性,又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进而在这种“结合”中,不仅使来自异邦的马克思主义于中华大地扎根,成为中国的,而且使历史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新时代不断创新升华,成为现代的。在“第二个结合”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有学者指出,“两个结合”客观上导致和实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15]从来源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要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并不是对其完全的简单复制,而是以“第二个结合”的方式,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焕发时代价值的文明形态。由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因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具历史实在性,因基于“两个结合”而具真理本土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即表明“传统”并非一成不变,承继传统只代表守正,而不代表守旧;只代表尊古,而不代表复古,只有对“传统”进行适时调整,使其因时而变、与时偕行、开拓进取,才能使传统永“流传”,并刚健有力。

中华文明守正又创新的特质使自身在历经五千年漫长岁月后依旧神采奕奕,究其原因其蕴含的“灵性”与“活性”发挥了重要作用。“灵”是灵敏、灵机;“活”是活力、生机。也即是说,面对社会变迁、时代变革,中华文明在“不变”以守正的基础上选择了“变”,从而展现了其灵性,因为如果始终固持自身的本来面目而不采取任何变通,那么,只会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在经历如何变化的思量后,中华文明以不断地创新凸显了其“活性”。审视中华文明发展历程,这种“变”,或者说创新,始终是历史的常态。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分封制、宗法制的瓦解,原先社会地位较低的士阶层开始活跃,逐步形成了思想文化上百家争鸣的场景。秦统一六国后,以法家思想为主导思想,但秦王朝的迅速灭亡导致法家思想衰弱。西汉武帝适应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时的儒学已是经由董仲舒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多家学说与儒家思想相糅合改造成的新儒学。这即是中华文明在发展中是否“变”及如何“变”的一个典型例子。之后,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则是儒释道三家长期争辩与融合后体现北宋初期思想解放的产物。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们又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批判继承。近代,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自身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其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使其反过来影响中华文明,从而使中华文明不断丰盈,并彰显时代魅力。

综上,缘于这份“灵性”,中华文明吐故纳新、独树一帜;缘于这份“活性”,中华文明积极进取、历久弥新。如今,我们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传承与发展,传承代表着守正、发展指向创新,这种创新即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正体现了中华文明集灵性与活性于一体的自强。因为这份自强,中华文明的精神图景才不断得以提升重塑,中华民族也因此更具内在动力,并再次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也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动力问题。

三、价值向度:中华文明多元聚合的统一性回答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本价值遵循的问题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16]这即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这种文明格局是由五十六个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通过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互联互通、互鉴互补,逐渐形成的。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单一的文明体系,而是由形态各异、类别多样、层次不同、功能多元的文化构成的共同体。^[17]站在文化创造者的角度看,包括各民族人民;从类型上看,包括农耕、游牧和渔猎文化等;从历时性上看,包括传统文化和现当代文化;从地域性上看,包括三秦文化、中州文化、岭南文化,等等。不同的文化各具特点。仅农耕文化,就在不同地域展现出不同类型,如有门巴、珞巴等民族的山林刀耕火种型,羌、彝等民族的山地耕种型,苗、瑶等民族的山地耕猎型,以及傣、侗等民族的丘陵稻作型等。而汉文化也通过与各民族文化长期的互动交流,在服饰、饮食、语言、民俗等诸多方面不断融入各民族文化元素,从而呈现多彩性。这些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在

各美其美的同时,又如石榴籽般紧紧抱在一起,构成一体的中华文明。

所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多元”不是分散、隔绝、封闭,而是相依相交、相补相益;“一体”既由多元组成,又将多元凝聚集成一共同体。“多元”之所以能够凝聚为“一体”,主要源于中华民族始终强调一统的价值遵循,中华文明始终追求统一的价值理念。中国历代王朝基本都遵循“大一统”的政治思想。这种“一统”,既有王道、江山、治权的一统,也有文化、华夷的一统。“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使得统一性成为中华文明的内在属性与必然要求。因为一旦“一统”的价值观念被中华文明充分接纳,那么,多元文化形态不仅不是中华文明负担,^[18]而且成了中华文明勃勃生机的源泉。实质上,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不仅包括文明的统一,也包括政治的统一、国家的统一。从孔子追求天下一家的大同理想和孟子呼吁天下“定于—”的主张,到秦统一六国,至此奠定中国统一的文化与制度基础。自秦以后,中国历史分分合合,但每一次再“合”的程度与力度一定比前一阶段更高、更强,而且每一次的再统一一定会有新的文化元素融入,并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的不断进步,最终凝结为坚不可摧的中华文明。统一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既整合了中华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又塑造了作为中华文明传承者的各族人民的精神品格,且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明格局建构提供了精神价值与精神力量,从而决定了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中华文明也始终以整体面貌呈现、始终牢固凝聚。

中华文明几千年来追求统一的价值遵循彰显了其内在的“韧性”与“磁性”。“韧”是坚韧,“磁”是磁力。一方面,正是这种韧性,使得各民族文化的多元聚合成为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始终不渝的孜孜追求,或者说,中华民族始终将整合文化多元的“一体”作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主线和前进方向;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磁性,中华文明才为各族人民所共同维系。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族建立的王朝还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始终强调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强调对中华文明的共建。尤其是在由少数民族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时期,无论是元朝,还是清朝,均强调其是在接续“正朔”,并在广泛吸收中原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主动将国家治理置于中华文明的体系框架下。如元朝,不仅在对内与对外的公文中以“正统王朝”自居,而且非常注重自身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汇通,尤其对于儒家文化,不仅将其应用到元朝政府的政治策略和社会治理中,而且允许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中华文明根脉。^[19]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时间最长的朝代,对于汉文化更加重视,^[20]虽然有出于政治考量的因素,但汉文化自身独有的魅力与吸引力是其最主要原因。在政治制度上,清朝政府承袭了明朝相关政治制度,认同古代帝王政治文化;在人才选拔上,虽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基本沿用了自隋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立的科举考试这一选拔官吏的制度;在语言文字上,要求清朝皇族子弟不仅要学习满语,还要学习汉语、汉字、儒家文化,等等。尽管在中国历史上,纷争、战乱有之,交融、和平也有之,但对中华民族的维系、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却是始终不变的坚持。

总之,正是这份“磁性”与“韧性”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塑的强大推动力。因为磁力与吸引力,中华文明吸纳各民族文化,最终百川归海;因为坚韧与坚持,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共创多姿多彩的中华文明。这正体现了中华文明集韧性与磁性于一体的自若。源于这份自若,中华文明几千年中始终以“统一”的价值理念示人,并在历史演进中,通过聚合的形式应对来自外界的一切挑战。^[21]中华文明正是在对现实挑战的积极回应中,完成了新时代的建构与重塑。这即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也回答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本价值遵循的问题。

四、实践向度: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回答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何繁荣发展的问题

中华文明在历经 5000 多年跌宕起伏后至今根深干壮、枝繁叶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所具有

的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一方面,这种包容性的思想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这种思想理念既体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也体现在治国理政层面。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西汉刘向在《淮南子》中说,“宽而栗,严而温”,^[22]并形象比喻,“山锐则不高,水狭则不深。”^[23]魏晋时期的曹植,^[24]唐代的孟郊,^[25]明代的冯梦龙^[26]等也都有相类似的表述。在《宋朝事实类苑·祖宗圣训》中则明确指出,“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在治国理政方面,《尚书》中说,“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27]《左传》^[28]《汉书》^[29]中也有近似论述。南宋朱熹则明确指出,“治国之道,在乎猛宽得中。”^[30]这即是强调施政者,只有怀抱宽容之心,方能治天下。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也体现在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如前所述,中华文明对于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创造出来的各具特色的文明形态,不仅以开放的胸襟予以接纳,而且最终百川汇流到中华文明中,使其成为多姿多彩的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分子。而对于异文化,尤其是外来宗教文化,中华文明既不封闭、也不排斥,充分彰显了其厚德载物的宽广胸怀。对于来自异邦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中华文明都宽容接纳,并在交流碰撞中互摄互融,既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又促使了外来宗教的中国化、本土化。佛教作为最早传入我国的外来宗教之一,在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代、唐末宋初等时期一度兴盛。^[31]佛教在中国历史上虽遭受多次劫难,但不可否认,其在诸多方面,如哲学、文学、艺术等对中华文明的繁茂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本身也在中华文明的熏陶中演进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教自唐永徽二年传入我国,在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中,既对中华文明的丰富,如在建筑学、医学、天文学等方面贡献突出,其自身也通过与儒家文化的会通,形成中国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曾经历唐朝时景教的鼎盛,元朝时也里可温教的风光,明朝中后期的再次传入,甚至清朝时期的“礼仪之争”,^[32]实质上,基督教一直在寻找一种更适应中华文明的形式以保持其存在。基督教文化在中华文明中,如在数学、天文、地理、音乐等领域留下深刻印迹;其自身也在20世纪50年代的“三自”运动和90年代的神学思想建设中,逐步实现了基督教中国化。由上可见,中华文明在与外来宗教文化的碰撞中,以兼容并蓄的胸怀,造就了今日中国多宗教文化共存的和谐局面。

特别要提及的是自汉代始,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的开辟进一步促进了中西方文明的交流融合。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达到鼎盛的唐朝,大量的异文化进入中华文明的视野,如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地中海文明、波斯文明等相继进入中国。中华文明没有如西方文明那般搞文明霸权或文化强势,而是敞开胸襟并博采众长,从而使自身更加生意盎然。丝绸之路也成了中华文明包容性凸显的重要载体。明清两朝,由于长期闭关锁国,阻断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互联互通,隔绝了中华文明向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借鉴学习的机会,最终被迫因落后而挨打。痛定思痛后,中华文明以对世界文明更加开放的胸襟,积极向西方学习,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直至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此不断为自身注入新鲜血液,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再造与新生。

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之所以能够海纳百川,进而光辉灿烂,是其“智性”与“傲性”发挥了积极作用。“智”是睿智,“傲”是傲气。从中国历史审视,每每遭受由社会危机而引发的文明危机时,中华文明均适时地进行自我调整、自我改造、自我完善。这种调整、改造与完善的重要方式之一即是对不同文明的宽厚包容、兼收并蓄。一方面,中华文明,作为文化聚合体,对于各民族文化,既允许百花齐放的繁华盛景,又将其包容汇聚为美美与共的中华文明。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睿智使然。另一方面,对待外来宗教文化,中华文明则显现出自己的睿智与傲气。中国封建统治时期,长期以儒家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并有土生土长的道教。那么如何对待似春风细雨般不断“浸入”的外来宗教,中华文明,一是宽容接纳,二是坚持“政主教从,多元通和”的治理策略,既将外来宗教纳入中华文明的体系

框架下,又在润物无声与恩威并济中使其适应中国土壤而中国化、本土化。而对于似暴风骤雨般强势入侵的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中华文明在被迫接受后,并未被西方工业文明所征服,而是对西方文明吸纳借鉴,从而促进了中华文明内涵的丰富及向现代文明的不断迈进。同样,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来自异邦的“主义”,中华文明既以开放的胸襟接纳了它,并将其用于指引前进的道路,又使其在中国扎根,实现“两个结合”。

正是这份睿智,中华文明才在丰富文化内涵与增强自身活力中,赓续传承至今;正是这份傲气,中华文明在对异文化彰显包容性的同时,始终坚持多样差异共存的整体性,从而在超越地域、血缘、信仰^[33]后凝聚为具有统一性的中华文明。因为这份睿智,各种文明的交往交融是中华文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始终不渝的坚持;因为这份傲气,中华文明对内实现了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创,对外坚持了中华民族的共进退、共坚守。这正体现了中华文明集智性与傲性于一体的自觉,“自觉”地将多民族文化交融汇聚、“自觉”地与各种文明交流互鉴、“自觉”地虚怀若谷、“自觉”地有容乃大。中华文明也在这种自觉中实现了文明的重塑与现代的转型,这即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也回答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何枝繁叶茂、繁荣发展的问题。

五、世界向度:中华文明和合共生的和平性回答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何种姿态融入世界的问题

“和”与“合”两个字最早的文字记载分别可以追溯到金文和甲骨文,意义分别为应和、及盖合、聚合、结合等。将“和”与“合”两字连用,最早出现于《国语·郑语》,^[34]在《易经》^[35]中也有论述。和合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融合了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等多个文化流派的思想。这一思想主要是强调事物具有差异性 with 多样性,并使这些具有差异性 with 多样性的事物共存共融。“和合共生”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中华文化的精髓,其中的“和”体现的是和而不同、万物并立、和谐相处的精神品格;“合”则展现了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精神价值。无论是“和文化”,还是“合文化”,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合共生”从古至今始终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不懈的价值遵循与行为坚守。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其最初目的不是为了领土扩张,而是为了维护本国安宁,结果开辟了丝绸之路,成功打通了中原、西域两地之间的交通线路。通过丝绸之路,既将中原地区的科技、丝绸等器物传播到西域,又将多样化的西域文化带回中原,从而使中华文明更加丰盈饱满,并加速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到达的国家与地区有三十多个,甚至最远到达了非洲的木骨都束国。^[36]从现存历史文献可以看出,虽然当时明朝国力强盛,但下西洋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侵占别国领土。郑和下西洋打通了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远洋,在促进不同国家、地区间贸易往来的同时,一方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西传,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和谐”的价值理念,热爱和平、睦邻友好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将西方的数学、天文等带回中国,使国人接触到西方的文化文明及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可以说,相较于西方文明的殖民掠夺,中国的“驼队”“宝船”满载和平、友谊和合作,向世界展现了大国的真诚与友善。这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37]从以上史实即可看出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思维属性,中华文明主张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的价值追求。这也成了贯穿中华史的重要价值支撑。

着眼新时代,中华文明依旧秉承“和合共生”的价值理念。世界上存在过多种文明形态,尽管划分标准不一,如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分别将世界文明分为八种、二十六种以及重新划分的八种,但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却是不争的事实。对于现存的世界文明形态,中华文明始终倡导人类文明发展多样化的路向,既不搞文化霸权,把自身价值理念

强加于他国或他民族,也不搞文化对抗,而是在充分尊重不同文明形态的基础上,直面世界人民共同发展困境,主张将所谓的文化壁垒打破,将亨廷顿以为的文明冲突丢弃,将美国政治学家应用于政治实践的零和思维摒弃,倡导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与繁荣。这既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38]思想的体现。

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秉持和合共生的发展理念,并将其应用于政治实践中,这充分展现了其内蕴的“仁性”和“慧性”。“仁”是仁爱、仁德,“慧”是聪慧、慧智。中国儒家思想讲“仁爱”,这种“仁爱”既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更是推及万物。孔子将“仁”的学说也施行于政治,形成仁政说。先秦时期的墨子,在看到民间疾苦、诸侯之间杀伐战争后,提出“兼相爱、交相利”,^[39]这也成为墨家的核心思想之一。中华民族将这种“仁爱”“兼爱”的思想运用于处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他文明的关系中。因为“仁性”,中华文明面对世界文明的纷繁复杂,始终以实现全人类福祉为价值取向,将仁爱、仁慈的价值理念由“爱”己,到“爱”人,再到“爱”世界万物;因为“慧性”,中华文明在面对文化博弈、文化冲突、文化霸权、文化殖民等价值观时,秉持“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念,主张不同文明形态的共存共荣,推动建立世界文明新秩序。正是这份仁爱与仁德,中国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正是这份聪慧与慧智,关于国际事务处理,中国先后提出了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

缘于“仁性”,中国没有“独善其身”,而是亲诚惠容,“兼济天下”;缘于“慧性”,中华民族在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侵略、欺负他人的宣示下,“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40]这正体现了中华文明集仁性与慧性于一体的自谦。因为自谦,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华文明在国际社会中充分彰显了其互学互鉴、互促互建的高贵品格。也正是中华文明的“仁性”“慧性”和这份自谦,中华文明才“低调”而又持续发展,并通过不断完善内部结构、改善外部形象而兴盛繁荣,成就为今日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也回答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何种姿态融入世界的问题。

综上,新时代,面对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任务,以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探研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历史向度审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彰显了其蕴涵的“恒性”与“执性”,体现的是中华文明的自信,以此回答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根基问题;从现实向度谛视,中华文明积极进取的创新性显现了其蕴含的“灵性”与“活性”,体现的是中华文明的自强,以此回答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动力问题;从价值向度凝视,中华文明多元聚合的统一性凸显了其内在的“韧性”与“磁性”,体现的是中华文明的自若,以此回答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遵循问题;从实践向度注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展现了其“智性”与“傲性”,这即是中华文明的自觉,以此回答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何繁荣发展的问题;从世界向度洞视,中华文明和合共生的和平性彰显了其内蕴的“仁性”与“慧性”,这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自谦,以此回答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何种姿态融入世界的问题。

注释:

[1][6][16]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2]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人类历史演进中,出现过26种文明形态,其中包括中国文明。

[3]“四大文明古国”这一概念最早由梁启超于1900年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提出。

[4][17]徐俊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时代意涵与建设路径》,《贵州社会科学》2023年第8期。

[5]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8页。

[7] 见《史记·礼书第一》。

[8] 《汉书·刘向传》中说：“君子独处守正，不挠众枉。”《先待御史府君神道碑》中写道：“守正为心，疾恶不惧。”

[9] 见《魏书·李彪列传》。

[10] 《诗经·文王》中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11] 西汉戴圣所著《礼记·大学》中，写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12] 西汉刘安所著《淮南子》中说：“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

[13] 清梁启超所写《少年中国说》中说：“惟进取也故日新。”

[14] 《习近平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5月5日。

[15] 田芝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6月16日。

[18] 青觉、陈林、徐欣顺：《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代文明理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4期。

[19] 参见孙红梅：《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元代“中国”认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20] 参见孙定芳：《顺康时期清廷正统性建构与满汉文化整合》，《社会科学动态》2022年第5期。

[21] 王婕、刘先江：《习近平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要论述的理论证成与实践路向》，《学术探索》2023年第10期。

[22] 见《淮南子·汜论训》。

[23] 见《新序·节士》。

[24] 《当欲游南山行》中说：“东海广且深，由卑下百川；五岳虽高大，不逆垢与尘。”

[25] 《投赠张端公》中说：“君子量不极，胸吞百川流。”

[26] 《增广智慧补》中说：“能容小人，方成君子。”

[27] 见《尚书·周书·君陈》。

[28] 《左传》中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

[29] 《汉书·五行志下》中说：“上不宽大包容臣下，则不能居圣位。”

[30] 见《宋名臣言行录》。

[31]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以来，一度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尤其江南地区更被推崇；隋唐两代儒释道齐头并进；唐末宋初禅宗独盛。

[32] 参见卓新平：《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及启示》，《中国宗教》2023年第4期；殷小平编：《元代也里可温考述》，余太山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胡铁生、蔡天柱：《基督教文化在明清的境遇及文化的相互影响》，《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8期。

[33] 郑明达、范思翔、成欣：《从中华文明包容性看中华文化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系列述评之五》，《人民日报》2023年6月16日。

[34] 《国语·郑语》中说：“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思是商契能把五种不同的道德规范相整合，并施行，使百姓安身立命。

[35] 《易经》中写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命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为宇宙万物都有各自运行变化规律，各行其道才能各得其所。

[36] 木骨都束国位于非洲东海岸，赤道以南，今索马里摩加迪沙一带。

[37] 见《礼记·中庸》。

[38] 见《易传·系辞传下·第五章》。

[39] 见《墨子·兼爱下》。

[40] 习近平：《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

〔责任编辑：刘 鋈〕